



中国外交与国际合作丛论

韦红一主编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 变革进程研究

胡宗山 韦红等○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胡宗山 韦红等◎著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 变革进程研究

—中国外交与国际合作丛论 —

韦 红 / 主编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
进程并推动其和谐化发展研究”（项
目批准号：10AZD029）的结项成果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研究 /胡宗山 韦红 等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2

(中国外交与国际合作丛论)

ISBN 978-7-5622-8352-2

I . ①中… II . ①胡… III . ①国际关系-研究-中国 IV .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2537 号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研究

◎ 胡宗山 韦红 等著

责任编辑:蒋圣芹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胡 灿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7792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1549(发行部)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2.5

版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90 千字

定价:6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导言	1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
二、国内外研究成果述评	5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观点及特色	17
第一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理论分析	23
第一节 当前国际体系的变革趋势与国际和平稳定	23
一、当前国际体系的变革趋势	23
二、当前国际体系的变革程度	33
三、国际体系变革与国际和平稳定之间的关系	37
第二节 国家单元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	39
一、体系变革的动力问题	39
二、国际体系与国家单元的关系	43
第三节 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	46
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46
二、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的经验教训	49
三、中国未来参与国际体系的总体战略	53
第四节 建构理性主义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	54
一、从理性主义到建构理性主义	55
二、建构理性主义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	62
第二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及历史经验	65
第一节 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	67
一、新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演变	69
二、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	74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的历史经验总结	97

一、参与国际体系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外交战略	97
二、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是参与国际体系的首要目标	99
三、明确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102
四、准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变化	105
五、高度重视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	108
第三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战略规划	113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战略定位	117
一、形势定位	118
二、中国角色定位	130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战略目标	136
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国际目标	136
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自身目标	142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战略指导思想	145
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	146
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具体战略指导思想(中观层面)	149
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具体战略指导思想(微观层面)	152
第四节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战略布局	156
一、总体布局(地缘政治布局)	156
二、具体布局(身份认知布局)	159
第五节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策略选择	160
第四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策略选择	162
第一节 软实力建设与宣传策略	162
一、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策略	163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国际宣传策略	171
三、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理念的国际宣传策略	178
四、塑造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的国际宣传策略	180
第二节 应对国际体系中不同行为体的策略	184
一、中国应对体系主导国(美国)的策略	184
二、中国应对体系优势集团(欧盟)的策略	189
三、中国应对发展中国家(集团)的策略	193
第三节 灵活的多层次外交策略	199

目 录

一、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外交策略	199
二、双边、多边并举的外交策略	201
第四节 内外兼修、和战两用的外交策略	204
一、内外兼修的外交策略	204
二、和战两用的外交策略	207
第五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制度供给	211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制度供给	211
一、制度供给释义	212
二、中国参与国际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分析	214
三、现行国际政治体系的主要载体——联合国的制度缺陷	216
四、中国参与国际政治体系的制度供给	223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制度供给	226
一、非均衡发展的牙买加体系	228
二、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创新路径	238
三、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创新的前景	249
第六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平台运用	253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政治体系变革进程的平台运用	253
一、联合国平台的运用	253
二、上海合作组织平台的运用	258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变革进程的平台运用	262
一、世界银行平台的运用	262
二、亚太经合组织平台的运用	266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平台的运用	269
四、“金砖国家”平台的运用	273
五、二十国集团平台的运用	276
六、处理好传统平台与新兴平台之间的关系	279
第七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内外资源整合	282
第一节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内外政治资源整合	282
一、当前国际体系变革与我国的政治资源	282
二、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国内政治资源整合	284
三、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国际政治资源整合	286
四、推进国际政治体系变革向着和谐化方向发展	288

第二节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国内外经济资源整合	289
一、当前国际体系变革与我国的经济资源	289
二、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国内经济资源整合	291
三、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国际经济资源整合	292
四、推进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向着公正、公平方向发展	294
第三节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国内外安全资源整合	296
一、当前国际体系变革与我国安全形势	296
二、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国内安全资源整合	298
三、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国际安全资源整合	300
四、推进国际安全体系变革向着互信、和平方向发展	301
第八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对外工作能力培育	304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基本素质要求	304
一、从事对外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	305
二、从事对外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规范	311
三、从事对外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和业务规范	316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特殊对外工作能力培育	320
一、复合型外事工作队伍培养	323
二、战略规划能力和微观谋略能力培育	331
三、外事工作能力、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培育	335
结论	342
参考文献	347
后记	353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当今国际体系是否发生本质变化,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一方面,随着地区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传统国际关系模式面临变革;另一方面,随着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不断加强,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形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特别是非西方新兴大国改革现有国际体系的诉求,对西方国家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矛盾不断涌现。未来世界秩序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领域合作的成败。如何进一步加快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方向发展,是当今学者和政治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国际体系。一方面为自身的发展寻找更多的国际机遇,另一方面也努力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国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将其作为中国外交努力宣传和实践的目标。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更是发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呼唤,以“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构想统筹国际新秩序内涵,进而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在道路和目标上更加清晰明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后,中国提出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如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亲诚惠容等,希望以此推动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出席雅加达亚非领导人会议开幕式上所说:“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

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①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②由此可见,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中更加积极和自信,愿意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作出中国贡献。

尽管中国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来推动国际体系变革,但是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仍引起种种猜测。第一种观点是崩溃论,认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会对中国国内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产生侵蚀性效应,最终导致中国的崩溃;第二种观点是威胁论,认为中国一旦挟自身庞大的规模进入国际体系,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中既有的运行规则和规范(也即国际制度),对国际体系产生破坏性影响;第三种观点是以融促变论,主张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逐步促进中国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第四种观点是脱钩论,认为参与国际体系使中国越来越受制于外部力量而失去独立性,国内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会迫使中国选择退出国际体系,重新回到封闭状态;第五种观点是相互变迁论,认为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有助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和进步,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的模式本身,也会以自身进步的经验促进国际体系发生创造性变革;第六种观点与第五种观点相似,即和平发展

^①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动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2015年4月23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4/23/nw_D110000renmrb_20150423_1-02.htm.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九大的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7—59页。

导　　言

论,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持与国际体系的合作性关系符合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利益^①。种种猜测实际上反映了大家都认同的一个问题,即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必将给世界和自身带来巨大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当今国际体系的新变化及世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种种猜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那就是我国应该如何抓住变革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推动国际体系向着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全球发展、有利于我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方向发展,消除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种种偏见,尽可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效地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书即是对这一课题的回答。

本书的研究成果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我国抢抓战略机遇期,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高国际地位,并为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提供战略思考。当前中国正全面走向世界,但如何从一个地区性强国迈向具有全球影响的世界大国,必须正确定位和谋划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与角色,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并通过创新性的工作将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付诸实施。本书在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研究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措施、策略与手段来推进国际体系变革向于我有利的和谐化方向发展,就是希望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飞跃性发展提供战略思考和历史经验参考。

第二,有利于全面把握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发展规律与特点,加深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认识,为我国对外关系战略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当前国际体系出现的新变革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同时也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哲学、理念和对外战略政策设计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我们加强对外战略的总体性、创新性和前瞻性思考,制定对外关系大战略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本书研究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为主体内容,这一议题本身就是对外关系大战略的首要议程。本书尝试解决若干长远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对外关系大战略的具体框架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第三,有利于提高对外工作质量,为建设高水平的外事工作者队伍、增

^① 苏长和:《中国与国际体系:寻求包容性的合作关系》,《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第9—10页。

强实际外交工作能力提供有针对性和创造性的对策建议。开创外交外事工作新局面离不开高水平的外事工作者队伍。当前我国的对外工作已经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大外交格局,但是我国现有的外交外事工作者队伍仍存在着来源渠道单一,知识结构过窄,主动性、创造性不够等缺陷。要提高对外工作质量,加强外事工作科学决策、科学运筹、科学管理的能力,就需要从内、外两个方向着手,改革体制、机制,提高对外工作的内外统筹与资源整合能力。本书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视角,特别研究了如何培育和提高对外工作能力以建设高水平的对外工作人才队伍。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培养统筹内外、驾驭全局的复合型外交外事工作人才,提高外交外事工作水平提供直接的对策建议和操作性方案。

本书的理论价值在于:

第一,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的发展。本书的研究重点是解决未来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问题,涉及的是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的对外关系认知与理论。本书研究了中国对国际体系本质属性、特征以及基本矛盾等的认识;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的历史经验教训;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宏观战略与政策定位等;对中国的和平共处思想、和平发展理论、和谐世界理念、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等也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与智力资源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外交理论体系的更新、完善和与时俱进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二,有利于促进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国际体系理论的发展。行为体与系统、单元与结构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从不同视角开展研究以及对二者关系本位的不同主张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既包括强调体系优先的结构理论,也包括强调行为体自主选择的单元理论。前者如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体系建构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后者如古典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但是现有理论的缺陷在于方法论上的绝对主义。强调体系优先的结构理论所持的是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强调单元作用则是方法论个体主义。这种方法论上二分的缺陷在于,忽视了现实生活中单元与结构的互塑与互动关系,忽视了互动进程将对行为体与系统两者都产生影响。本书致力于探讨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它将以内外互动——“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为论述平台,以反映进程理论的建构理性主义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的解析与设计,尝试在理论上导引一种进程主义的国际体系研究范式,以丰富、促进

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本书倡导的进程性逻辑而不仅是结果性逻辑或适当性逻辑将为国际体系理论提供新的思考视角。

二、国内外研究成果述评

(一) 国内研究成果述评

目前关于国际体系变革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该领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特征研究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皆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或变革中,只是对于衡量国际体系转型和变革的标准及特征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论述。秦亚青在《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国际体系转型的分析框架,认为国际体系的本体变化以体系单位性质变化为基本标志,国际体系内部变化则体现在体系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三个要素的变化上面。运用这一框架进行考察,他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虽然显现出许多体系自身变化的迹象,但体系的本体转型并未出现^①。林利民认为考察国际体系是否进入转型轨道,要考虑这样几大变量:(1) 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对比是否出现了调整和质的变化,是否引起了国际权力分配和结构的变化。(2) 世界领导权是否开始了“周期性转移”。(3) 原有国际制度是否开始发生重大调整。他以这些变量来衡量,认为当前国际体系已步入新一轮转型轨道^②。孔庆茵认为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分配变化、体系规范和外部因素的变化是导致体系变革的三个因素,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在结构、行为体和规范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使得以它们为基础的当今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变革,并呈现出新的面貌^③。俞正樑则认为当今体系变革

^① 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5—37页;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13页。

^② 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1—8页;林利民:《G20崛起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仅仅是起点!》,《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36—38页。

^③ 孔庆茵:《国际体系变革与新秩序的特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28—131页。

尚未达到转型的临界点,但是已经广泛涉及观念结构、议事日程、体系结构和规范结构的变革,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特点^①。陈玉刚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不只是表现为大国地位的升降,更体现为一个历史长时段中主导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原则规范的变化。一个体系意味着一代制度、价值和规范^②。

关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分领域变化特征,秦亚青认为就体系结构而言,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是目前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特征;就体系制度而言,目前西方垄断国际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时代正在过去,新兴大国正在从边缘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就国际观念结构而言,目前欧洲在积极推行各种理念方面处在一种类似急先锋的地位,新兴大国在观念传播和规范推行等方面仍处于被动地位^③。黄仁伟认为在国际体系的三个主要部分:国际机制、国际秩序和大国格局之间,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的变革比大国格局改变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要小得多,今后相当长时期,国际机制的变革度要超过大国格局变化,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④。夏立平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体系的转型出现了如下特点: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国际力量结构多样化、国际多种互动模式共存、国际机制在各方博弈中变革发展^⑤。唐永胜提出国际体系变迁的四个特征:第一,世界形势仍将继续保持总体和平稳定,但局部战争和冲突仍难以消除,一些地区还可能出现激化趋势。第二,国际力量对比加速调整,但难以出现颠覆性的根本变化。第三,体系变迁带来的不平衡性更趋显现,经济体系转型快于政治安全转型。第四,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协调并存,将成为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⑥。苏长和认为当前国际体系是主权国家体系,其具有

① 俞正樑:《论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特征》,《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6期,第1—8页。

② 陈玉刚:《制度创新、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革——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视角》,《国际观察》,2013年第4期,第25—31页。

③ 秦亚青:《国际体系秩序与国际社会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3—5页;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13页。

④ 黄仁伟:《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第5—13页。

⑤ 夏立平:《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系的转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第66—70页。

⑥ 唐永胜:《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战略选择》,《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第4—5页。

主权国家间互相承认、互相确认、地区合作和地区性组织兴起、避免大国陷入结盟对抗的特点和作用^①。

2. 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总体历史进程，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从对立到有限参与、全面参与，再到积极推动构建等几次转变。由于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各阶段的划分标准不同，目前学界主要有“三阶段论”与“四阶段论”两种主流观点。

“三阶段论”的代表有朱立群、王俊生等人。朱立群、黄超以改革开放和20世纪90年代初为界，将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基本上是对立的，参与程度有限；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部分参与国际体系，从现行国际体系的一般参与者向积极参与者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中国不但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负责任的建设者，对国际体系的参与到了一个主动和自觉的新阶段^②。王俊生、文雅认为，第一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初的10多年中，中国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体系；第二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标志着中国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第三阶段，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融入当今国际体系^③。

“四阶段论”的代表有陈启懋、俞新天、苏长和、李慧明等人。陈启懋认为可以将新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到1971年10月，中国支持并参与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对美苏两极体系；第二阶段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末，以进入联合国为标志，中国开始融入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在国际体系内坚持反霸立场和反霸斗争；第三阶段从1979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是中国从现行国际体系内的一般参与者向积极参与者转变的转型期；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中

① 苏长和：《国际体系发展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第14版。

② 朱立群、黄超：《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第160—169页。

③ 王俊生、文雅：《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及特点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51—55页。

国不但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负责任的建设者^①。俞新天等著的《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一书认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体系外的造反者、体系内的疏离者、积极参与者和建设性贡献者”的演变^②。苏长和在《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一文中从中国外交与国际体系变革互动的角度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中国自身的选 择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产生了三次重大影响: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中国是率先冲破冷战体制的大国之一,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关系的改善突破了僵硬对抗的冷战体制;第二次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它标志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全面合作时代的开始,并从经济意义上带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第三次是21世纪以来,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耶鲁大学以及中共十七大等多种场合发表的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它们表达了中国有关世界秩序的伦理政治主张,这些主张与中国日益强大的物力相配合将会对既有世界政治秩序演变产生重要影响^③。

3. 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研究

对于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国内学者普遍认同中国不做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在此共识下,一些学者强调对当前国际体系的融入,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在融入的过程中还应发挥一定的作用。

强调中国对当前国际体系融入的学者有刘凯、李华锋等。刘凯等认为,中国不能做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中国应该选择适应和顺应当前国际体系的国际战略,比较科学的选择是参与融合、主动而不谋求主导,在体系内维护国家利益,做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④。李华锋提出中国应当在坚持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原则基础上,以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与塑造和谐国际社会为目标,更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在融入中做到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并重,灵活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身份,着力处理好与大国和

① 陈启懋:《国际体系和中国国际定位的历史性变化》,《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第35—40页。

② 俞新天等:《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

③ 苏长和:《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21—31页。

④ 刘凯、王云海、李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52—56页。

导　　言

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①。

另有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应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庞中英将这些作用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做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第二,做现存国际秩序中不合理性、不公正性的批评者;第三,不但要做目前国际秩序的批评者,还必须为未来的国际秩序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第四,在促进世界稳定中发挥作用;第五,在地区体系中发挥作用。对于如何发挥作用,他提出中国要转换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旧角色、定义新角色,中国外交必须走向全球,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将增加中国力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②。唐永胜在《在国际体系变迁中实现国家安全》中指出,国际体系变迁将为中国崛起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可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出现了新的形式,例如在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相互交织,内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互动性增强,由发展带来的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不仅使中国迎来了长达40年(仍在持续)的高速发展期,还间接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层次变革,从而为稳步推进改革注入了动力;另一方面,随着实力的不断攀升,中国不仅逐步摆脱了边缘国家身份,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还具备了通过自身的制度、模式和观念创新,引导、推动和塑造国际体系转型的能力^③。伍贻康认为中国已是现行体系的一部分,不需要也无能力充当挑战者,但也绝不应该做被动消极的体系维护者,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推进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发挥多边沟通的桥梁作用和建设性作用^④。秦亚青认为我国参与国际体系,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第一,在全球问题上积极推进合作,做负责任大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自身能力;第二,在地区合作方面积极发挥作用,通过提高能力加强地区合作;第三,实现国内发展的转型和升级^⑤。苏长和《战后国际体系的未来

① 李华锋:《论当今国际社会的特点及对中国国际社会战略的启示》,《桂海论丛》,2006年第6期,第63—65页。

② 庞中英:《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17—22页。

③ 唐永胜:《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战略选择》,《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第4—5页。

④ 伍贻康:《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转型与中国的应对》,《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第58—63页。

⑤ 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5—37页。

发展与中国外交理论》认为,不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始终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始终都是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中国外交以实际行动推动了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扩容,使得联合国体系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就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来说,苏长和认为中国崛起既是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也是国际体系转型的结果,两者相互促进^①。

关于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则认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不是某种先知先觉的抽象理念的驱动,而是首先体现在中国自主地、积极地、稳步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各种实践活动。参与国际体系的各种实践活动过程本身是行动实施的主要驱动力量。西方国际主流关系理论之所以难以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行动,是因为这一过程不是单纯的利益权衡使然,也不是单纯的制度和规范约束使然,而是行为体自主性的实践使然。该研究成果以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基点,以“实践过程”为研究内涵,以“实践逻辑”为行为体的行为动力。根据这一分析模式,该研究在“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和“秩序变革”之间建立起一个因果作用机制,用于解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国际政治安全体系及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②。

关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方式,崔荣伟认为有四种:第一,与周边国家建立互惠互信的经济合作机制,将自身的壮大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摒弃了通过侵略性或掠夺性方式来增强自身实力的传统做法。第二,为克服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结构性困境,提出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努力避免双方走向零和式竞争。第三,将地缘经济合作注入地缘政治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地缘政治的零和竞争属性。第四,积极推动成立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但强调与既存国际组织和机构之间的互补性,淡化两者间的竞争色彩^③。

4.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未来战略、策略研究

对于我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未来战略、策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

^① 苏长和:《战后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与中国外交理论》,《国际展望》,2015年第3期,第2—4页。

^② 秦亚青:《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

^③ 崔荣伟:《国际体系转型:理论创新与中国经验》,《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1期,第49页。